

壹、前言：中國興起與向外擴張的再理解

近年來，中國挾著全方為影響力的快速興起，逐漸形塑出促使國際體系變革的關鍵動力。此種源自政權維穩、確保內部社會秩序，乃至於發展外向輻射的權力關係，逐步擴散到全球政治、軍事與安全、金融與貨幣、經濟與貿易、非傳統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崛起的中國不只是國際政治的重要現象，更改寫了後冷戰世界政治經濟史，同時也重新帶動亞洲的崛起，將亞洲推向國際政治的前沿。¹ 中國與亞洲的雙重崛起，引起國際學界的高度重視，而國際社會該如何理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治理邏輯，亦成學術研究與政策探索的核心關注。回顧近期探討中國崛起情勢的研究文獻，本文認為其中存在至少四種研究理路，分別關注興起中國的「新影響說」、「新動力說」、「新平衡說」及「新施為說」。

首先，以「新影響說」為主要關切的研究文獻多半探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全球與特定區域的影響力。相關論者深入評估中國崛起之政經勢力，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議題上的影響力；更有研究從文明過程的對照觀點，檢視中國化（Sinicization）如何展現出相對於歐美西化對於全球影響的不同圖象與路徑。²

其次，「新動力說」的專著則是特別關注國際體系內對抗力量之間的競合關係。其中有不少論者主張，中國的崛起代表亞洲海權大國的躍進，甚至將對現有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閉鎖權力結構進行逆襲。類似的論述顛覆了過去歐美海權大國（美國、英國）對抗亞洲陸權大國（蘇聯、中國）的分明結構。更有甚者，這些亞洲的海權，不唯獨中國，就連南亞的印度、東南亞的印尼等新型海權大國的快速崛起，都可能將改寫亞洲與全球的新權力結構（Sakhuia, 2011）。

如果中國與其他亞洲海權國家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結構，那麼國際社會如何發展、醞釀出足以控管大國關係、緩解潛在衝突的機制或制度設計，有其迫切需求。當然，這也間接導引出研究中國崛起的第三種觀點：「新平衡說」，相關論者特別關切現狀霸權（the status quo hegemon）美國與修正型

¹ 由國際金融政治研究權威學者 Cohen 主編的新書，即針對亞洲大國如何在國際政治經濟議題中施展權力、發揮影響力進行深度比較研究。其中 Cohen 教授所撰寫的〈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長征（long march）〉一文，即說明了中國如何透過人民幣政策的制定，試圖影響國際貨幣政治的走向（Cohen & Chiou, 2013）。

² Katzenstein（2012）曾以「中國化」作為文明進程的研究參照；另外，針對中國崛起對於周邊區域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評估與批判性分析，亦可參考 Hsiao 與 Lin（2009）。

強權 (revisionist power) 中國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 (Odgaard, 2007; Zhu, 2006)。³ 特別是當 2013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 (B. Obama) 與習近平在加州進行「歐習會」時所提出的「新型態大國關係」，隨即成為國際學界與中、美政策社群就現有的大國關係該如何管制、如何推動實質合作、建立戰略互信的辯論焦點 (Glosserman, 2013; Lampton, 2013; Ren, 2013)。除此之外，亦有研究站在非對抗面的立場，建議美國應該要重新理解中國，並且發展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以避免美、中對抗性新冷戰的形成 (Gross, 2013)。

最後，要瞭解中國崛起的實貌，研究者有必要從北京對外戰略的作為與布局著手。近年來陸續有研究文獻深入瞭解中國對外戰略的新舉措，本文將相關研究成果歸納為「新施為說」。中國的崛起將形成新的權力體系，透過金援、對外投資、國企、人民、孔子學院 (Confucius Institutes) 等海外布局來拓展北京的全方位影響力，形成獨特的「中國式的全球化」(Chinese globalization) 圖象。⁴

上述四種不同的主張，扼要地勾勒出近期中國政經實力向外擴張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導向。本文認為，無論研究者探討的焦點在中國的新影響力、新動力、平衡新局或新施為，對於北京而言，如何持續性地提升其影響力並擴展全球布局，找到足以含納中國穩定崛起的立足點，才是政治菁英所關注的焦點。其中，鄰近的東南亞成為北京自 1980 年代開始以「周邊為首要」的新外交政策核心要件，也被視為是支撐中國快速興起、走向全球的戰略腹地。

當前針對中國對東南亞關係的研究文獻猶如汗牛充棟，研究者亦持續地探索北京經略周邊區域的新政策工具或新治理思維。探討「中國式」的對外政策舉措在學理與經驗層面上，對於當代治理研究的知識累積來說甚為重要。特別是依循前述第四種研究理路「新施為說」的專書與論文，嚴肅地檢視中國採取哪些新政策施為及其對周邊區域安全的衝擊、討論北京如何靈活運用多元的經濟戰略來達成特殊政治目的，或者深入探索中國國際形象的改造路徑，均具備與當前國際研究理論對話的意義 (Jones, 2013; Kang, 2007; Storey, 2011)。本文認為，類似的新布局施為與舉措大多蘊含著戰略雙重性 (strategic duality)，亦即一方面被視為是執行中國走出去外交的戰略工具，另一方面則具有強化內政

³ 近年來，亦開始有論述強調「中、美之間在關於全球穩定與繁榮的各種重大議題上，肩負起重要的責任」(黎弘、劉易斯·鄧恩、拉爾夫·科薩，2013)。

⁴ 在近期出版的相關文獻中，經濟影響力與經貿安排的操作是一大重點，如 Cheung 與 de Haan (2013)、Huang 與 Yu (2013)。另外，中國的全球布局亦可參見 Shambaugh (2013)、Sun 與 Lancaster (2013)。在區域方面的影響力探索新作，可參考楊昊 (2013a)、楊昊與蕭新煌 (2011)。